

周代男女角色定位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吴晓华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为考察周朝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通过对历史文献辨析,指出周代男女作为社会和家庭成员从小就在男权社会所需要的模式下接受教化,并被区别对待,后逐步形成了“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行为模式。分析结果表明,这一行为模式至今仍影响现代人的生活:现代男女受教育程度、在业和再就业比例差距拉大;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

关键词:周代;男女;角色定位;现代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3-0086-07

关于周代男女角色定位问题,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不少,学者通过不同视角分析和揭示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比如,杨萍女士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角色,指出为人母者社会地位最高,为人妻者社会地位最低,为人女者社会地位介于两者之间;但是不管女性处于何种角色,周代女性在整体上对于男子的屈从地位却是始终不变的,即便是“为人母者”,其所具有的些许权力也只是强化父权的延伸^[1]。高锦花女士则主要从周代社会的婚礼和丧礼制度方面探讨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认为在婚礼中周代妇女在婚姻自主权、人格、财产等方面基本上没有主动权,在丧祭仪式中女子往往处于配祭和从属的地位^[2]。葛志毅先生认为,在初民社会两性分工产生之初,由于男女在身体与生理上的自然差别,就已经潜藏着日后两性分工的不平等因素,因而当条件一旦成熟时,原来潜在的不平等因素终至充分发展显现出来,其直接结果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制家族的出现^[3]。赵东玉先生认为,周代的“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封建礼教,有利于防范和杜绝两性间非法的性关系,实现男女性别角色正常的生育使命;可以

形成男女角色的彼此互补,从而达到“夫妇有义”的稳定秩序;因此,性别角色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男性和女性固有的个人特性”,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是历史进程无可回避的现象,是人类进步的必要代价^[4]。总之,上述各位学者或从周代的制度方面、或从周代的礼仪方面揭示妇女卑微的社会地位。本文则从周代男女角色定位这一视角,把男女置于社会和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动态变化过程中来考察,以展示周代“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行为模式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

一、男女作为社会成员的角色定位

作为社会成员,周代男女从降临人间起就按照男权社会所需要的模式被培养和定位,在被区别对待和教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利于推行父权宗法制度的角色意识。

这一男女有别的对待和教化方式从人一出生时就开始了。《诗经·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嗷嗷,朱芾斯

收稿日期:2009-03-04

作者简介:吴晓华(1970-),女,江西余江人,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

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5]。这是指男婴一生下来,睡的是床,玩的是玉器,被期望将来能成为王公贵族;女婴一来到人世,睡的是地,玩的是纺轮,被期望将来成为唯酒食女工是问、不给父母惹是生非而让父母遭受非议的贤妻良母。这样,孩子一降临人世,父母就给予不同的角色期待,这些不同的角色期待通过现实生活中之种种礼仪或仪式体现出来。《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郑注曰:“设弧、设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帨者,事人之佩巾也。”^[6]“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既是表示男女性别之异,也是表示男女之事相别。孙希旦曰:“愚谓男射女否者,女子卑,略其礼也。”^[6]

在小孩9岁以前,对男女施教的内容基本相同。“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6]陈东原解释说:“以声音说,唯是上声,俞是平声,唯音强,俞音弱。以字义说,唯是恭敬之意,俞有忧患之意。”^[7]有些学者从陈氏解释而得出“男尊女卑”的结论值得商榷。孙希旦注曰:“愚谓《曲礼》‘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虞书》‘帝曰俞,往钦哉’,又曰‘俞,往哉如谐’,是唯、俞皆应辞。但唯之声直,俞之声婉,故以为男女之别。”^[6]这说明“俞”并非女性应答的专用语,只是因为“唯”声直,“俞”声婉,以此区别男女之应辞。正如吴增祺所言:“‘唯’扬而‘俞’抑,革刚而丝柔,皆从其类而教。”^[8]及男女稍长,开始学习基本知识,如数学、方位名称等,“六年,教之数与方名。”^[6];7岁,即开始灌输性别意识,“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6]8岁,开始德行培养,教以逊让之礼,“八年,出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6]

儿童在10岁以后,开始授以男女授受不亲观念,强化男女之间的界限;对男女所教内容也大为不同,它决定着男女成年后的角色定位。男孩被按照“大丈夫”的模式进行培养,学习诗书礼乐射御。“十年,出就外傅,居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6]女孩学习四德,即妇言、妇容、妇顺、妇功,学织布缝衣,习助奠之礼。“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

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郑注曰:“婉婉合为妇容。此分婉为言语,婉为容貌者,其意以此上下备其四德,以婉为妇言,婉为妇容,听从为妇顺,执麻枲以下为妇功。”^[6]

男子成年以后可以在社会上大展宏图,“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6]女子则“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6],此后,在家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得以确立。

周代男女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定位是“男耕女织”。如《墨子·非乐上》云:“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廩府库,此其分事也;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繆(纛),此其分事也。”^[9]除王公大人、士君子等贵族阶层治政收利之外,妇人之织纴与农夫之耕种是基于性别不同的社会分工。因此,作为社会成员,女性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即解决家庭成员“穿”的问题,养蚕织布、甚至蓄养家畜是其份内之事,但活动范围仍然被限制在家庭之内,很少染指其他社会事务。

对男女实施的教育内容和进行的社会分工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基于两大前提:一是基于男刚女柔的自然差异;二是基于维护父权宗法制度秩序的需要和人们“男尊女卑”观念的作用。因此,在关于周代礼制问题上应该做细致的考察,而不应把一切的礼仪、规则都放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去解释,这样往往容易得出偏狭的结论。

二、男女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定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任何男女首先是作为家庭成员而存在的,因此,考察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对于了解男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男女作为家庭成员的角色很多,下面主要介绍男女作为子女、作为夫妻、作为父母的角色定位。

(一)子女的角色定位

任何男女,首先要承担的是为人子女的角色,这可以区分为两种。

第一,作为父母的对应词“子女”而言。为人子女,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将来从事何种职业,都要接

受父母安排,即使个人的婚姻大事,亦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郑风·将仲子》曰:“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5],这表达了女子对自身终身大事的无奈情绪。不仅女子如此,男子同样也要受到父母的约束。《诗经·齐风·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10]尽管明媒正娶是周代主要的婚姻规则,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适婚男女无法通过这一规则实现他们的愿望。因此周代还存在“会男女”的习俗,即一定程度的自主择婚形式。《周礼·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6]《诗经·郑风·溱洧》专门描写男女聚会、戏谑、定情之情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10]在郑国的上巳节(祓除不祥的日子),许多男女借此良机谈情说爱。由此可见,周代除了通过礼制规定男女的行为模式之外,还继承了古老的自由遗风。

相对于“为人子”而言,“为人女”除了存在前述教育内容上的差异以外,由于女孩被认为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且出嫁后很少有机会侍奉自己的亲生父母,因此往往境遇悲惨,常遭唾弃,甚至有性命之忧。《韩非子·六反》就有“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者。”^[11]作为贵族家庭的女儿,还有可能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云:“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12]

第二,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女婿和子妇。由于周代普遍流行的是女子出嫁后从夫而居,男性“入赘”的现象极为少见,所以,一般这层意义上的子女多指成家后的子和子妇。

子与子妇对待父母舅姑要“孝敬”。子在鸡叫初遍必须起床侍奉父母洗漱、梳头、更衣。“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緹、笄、总,拂髦、冠、綏、纓、端、鞶、绅、搢笏,左右佩用……”^[6]。子妇侍奉舅姑要象侍奉父母一样,“妇事舅姑,如事父母。”^[2]子妇早起穿戴整齐之后要往父母舅姑之所嘘寒问暖,遇痛痒要按摩搔弄;出入时,则左右扶持;还要根据父母舅姑的饮食喜好,酌情备餐,直到父母舅姑满意才罢。“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6]林唯所

欲,枣、栗、饴、蜜以甘之,菹、菹、粉、榆、兔、薤、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6]子妇只能在伺候父母舅姑吃完之后才能用餐,“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馐,既食恒馐。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妇佐馐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馐。”^[6]子女孝敬父母,要爱父母之所爱,敬父母之所敬,此“敬”、此“爱”要持续终身,直到自己生命结束。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6]

子与子妇对待父母舅姑要“顺从”。在父母舅姑之所,只能惟命是从,丝毫不敢怠慢,不能打喷嚏,不能咳嗽,不能搔痒,热不能脱衣,冷不能加衣。“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哂、噫、嚏、咳、欠、伸、跛、倚、睞视,不敢唾、洩。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蹶,褻衣衾不见里。”^[6]为了取悦于父母舅姑,要放弃自己的喜好,不敢拂逆,“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嗜,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待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6]子对待妻妾的态度也要听从父母的旨意,即使父母去世了也一如既往。“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6]

由于父母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可以让子休妻,因此,子妇在夫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侍奉好舅姑,不论遇到大事、小事,都要先请示于舅姑,“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6]因为子妇顺从则家和,勤俭则事兴。《礼记·昏义》云:“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姑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家可长久也。”^[6]但是,即使子妇整日操持劳作,也不得有私产。《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6]即使有人赠送东西予子妇,也只能献给舅姑,除非舅姑反复赐予,否则不得私藏。“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

得命,如更受赐,藏以待乏。”^[6]若子妇要送东西给自家兄弟,则须经得舅姑许可,“妇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姑,赐而后与之。”^[6]

当然,子顺从父母应当是有限度的,在遇到父母有过错的时候,为顾全大局,子应大胆谏诤,但方法要得当,语气要柔和,时机要适宜,“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6]即使由此招致父母毒打,也不敢心存抱怨,仍然一如既往孝敬之,“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6]

总之,作为子女要终身孝敬、顺从父母舅姑,以父母舅姑的好恶为好恶,不能违逆父母舅姑的旨意。就父母生养教育子女而言,为人子女终身孝敬父母理所应当,但是,过度的愚孝会压抑人性的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可见,周代父权宗法制不但严重束缚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和潜能的发挥,而且很大程度上剥夺了男性自主选择权。然而,社会的礼仪规则并没有象规定子妇不得有私货那样规定男子,这表现家庭对于子妇的提防,那么子妇在夫家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 夫妻的角色定位

夫妻关系始于婚礼。婚礼是人类繁衍后代的前提,更是万世兴盛的基础,《礼记·郊特牲》载:“天地合,而后乃物兴焉,夫婚礼乃万事之始也。”^[13]《礼记·昏义》亦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6]为了家族的繁荣昌盛,周人对待婚礼特别谨慎,要经过许多程序才能最后成婚。《礼记·昏义》曰:“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朝,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6]郑玄注云:“吉日男氏定之,然必请于女氏,女氏辞而后告之,示不敢专也。”^[14]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的主要是男方,“女氏终听男家之命。”^[6]男方对于婚事的主导作用暗示婚后夫妻的角色定位。

夫妻的角色定位体现在夫妇之礼上。夫妇之礼非常重要,有夫妇之礼才有君臣之礼。“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6]《周易·序卦》云:“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15]夫妇之礼首先是男帅女从,《郊特牲》云:“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13]男帅女从表现在祭祀上,则男主女助。《礼记·祭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13]其次是夫妇各守其

道。男子汉大丈夫的德行就是委任功业,扶助万物生长,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长万物之义也。故谓之‘丈夫’。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知可为者,知不可为者;知可言者,知不可言者;知可行者,知不可行者。是故,审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正夫德者。”^[16]女子的德行就是顺从于人、屈服于人,不能自行专断。“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闺门,事在馈食之闲而正矣,是故女及日乎闺门之内,不百里而奔丧,事无独为,行无独成之道。参之而后动,可验而后言,宵行以烛,宫事必量,六畜蕃于宫中,谓之信也,所以正妇德也。”^[16]男子励精图治、虑谋大业,“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6]。然而女子则操持家务、侍奉老小:“夫妇人之礼,精五饭,晷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矣。”^[17]《周易·彖传》释“家人卦”说:“家人,女正乎内,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15]“男不言内,女不言外。”^[13]各司其职。

上述夫妇之礼体现了夫贵妇贱。“男女不同橐枷,不敢悬于夫之櫜,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湫浴。夫不在,敛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6]妇之衣服不能悬挂于其夫衣服之上,不能放在夫之衣柜;夫不在时,还要小心谨慎地把其卧具收藏好。在男女关系问题上,虽然也实行一夫一妻制,但是,男子除有一妻之外,还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妾。然而男子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就要求女子要尽妇道、遵妇德,对丈夫从一而终,即使丈夫去世,也不能再嫁。“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陈浩注:“币诚辞腆,是欲告戒为妇者以正直诚信之行信其能尽事人之道,信其能有为妇之德也。”^[13]

在周代,夫妇之间“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行为模式对于妇女来说是极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和角色分工主要是由女子出嫁后从夫居以及经济上对于丈夫的依赖所造成的,而父权宗法制是其根本原因。

(三) 父母的角色定位

男女除了在家庭中扮演子女、夫妻的角色之外,扮演好父母的角色尤为重要。首先,培养教育子女。子女将来应该如何行为、是否能够实现社会、家庭对其角色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从小的培养

尤其是处事观念的灌输。他们教子为夫之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8]教女为妇之道:“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8]。其次,对晚辈的爱要节制。对晚辈的怒要释怀;以身作则,有礼有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13]最后,要合理统一管理家庭财产,尤其是监督子妇,不允许其有私蓄。在舅姑眼里,子妇往往带有外人的色彩,因此常常多加防备,并以“出之”作为对子妇行为的限制条件。《吕氏春秋·孝行览第二·遇合篇》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19]《韩非子·说林上》:“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11]

综上所述,周代男女从幼至长及老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的设置和倡导旨在巩固父权宗法制度,这一制度的加强又进一步约束男女的行为,它构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女性是最大的受害者。然而,绝大多数女性对此并不自觉,认为“三从四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韩非子·忠孝》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1]这也是妇女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周代男女角色定位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周代“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角色定位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在生产中的作用逐渐凸现出来,母系氏族的社会生产结构开始被打破,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主的父权宗法制,它通过各种礼仪来限制女性的活动,以达到奴役、控制女性,使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目的。除此之外,女性的悲惨境况与其“柔弱”的自然之质不无关系: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在身心上具有更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它是女性之所以被束缚在家庭其中的一个自然原因,也是男性能够统治女性几千年的可能前提。

由于上述原因,周代“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仍然很大。这种影响表

现在许多方面。

(一) 受周代“男主女从”观念影响,现代男女受教育程度、在业和再就业比例差距很大

中国古代女性被奴役的状况延续了几千年,到了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确有很大改善。男女平等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赞同,但实质上是否平等值得怀疑。根据有二:第一,就男女受教育程度而言,女性受教育程度要比男性低得多。从2006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相关数据表反映:在15岁及15岁以上的男女数量总额相当的情况下,女性文盲在总文盲数中所占比例为73.62%,而男性只占26.38%。尽管中国6岁及6岁以上人口男女的数量总额相差不多,但是在未上过学的人数中,女性占总数的72.67%^[20]。第二,就男女在业和再就业比例来看,女性比男性在业比例低,且再就业更难。根据2000年12月1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末,18至64岁的城乡女性在业比例为87.0%,比男性低6.6个百分点。与1990年相比,城镇男女的在业率均有下降,男性从90.0%降至81.5%,女性则从76.3%降到63.7%,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在业率下降幅度更大。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也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21]另外,调查发现,许多人仍然认为女性嫁一个好丈夫比什么都重要。对社会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34.1%的受调查者表示赞同。发人深省的是,女性支持该观点的比例高于男性7.1个百分点,达37.3%^[21]。由此可见,周代的男主女从、男子优于女性、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现代人的潜意识之中,然而女性的表现尤甚。

(二) 受周代“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影响,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纷纷从家庭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源,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界限不再象周代那么严密清晰,然而,女主内的观念在人们潜意识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孩子依旧是女性应尽的义务。这样,对于已就业的女性来说,不仅要承担社会工作,与男性共同分担家庭的经济责任,还要负责家务劳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虽然给予女性更多的空间,赋予女性更多的发挥自身潜力的机会,但

是,这势必给女性带来源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农村妇女的境况与城镇女性境况相似,既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要包揽繁重的家务劳动。就纯粹的家庭妇女而言,除了法律给予一定形式上的权利之外,女性的处境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由于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在家庭也只能是依从于丈夫。相关调查显示:有85%以上的家务劳动包括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比男性多2.7小时,城镇在业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平均为2.9小时,仍比男性多1.6小时。有53.9%的男性和50.4%的女性仍然认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21]。这说明从周代延续下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占据一定地位。

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社会变迁,但是周代“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意识仍然残留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对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四、结 语

周代男女一生都受到各种礼仪规范的教化和约束,这些教化和约束渗透和弥漫在他们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当中,逐步形成了有利于推行父权宗法制度的角色意识,确立了有利于男性统治的“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的行为模式。虽然商代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却仍然存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妇女地位尽管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她们拥有一定的属于自己的财产,可以直接参与政治、军事、占卜活动,这被周武王责难为“牝鸡之晨”、“惟妇言是用”,这一现象说明商代妇女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周人主张的“牝鸡无晨”则反映其男尊女卑的价值观。为什么商代妇女拥有比周代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除了如上所述商代存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之外,据王蓉分析,商周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殷商社会,畜牧业较为发达,游牧民族的妇女往往较为活跃,她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周代社会农业较为发达,男耕女织的经济分工模式造就了社会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制定前所未有的礼仪等级

制度和宗法制度加以巩固,而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在周人的观念体现就是“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它一直影响到几千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 [1] 杨 萍,李艳波.周代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地位探析[J].学术交流,2006,12(10):151-153.
- [2] 高锦花.周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探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0(1):107-110.
- [3] 葛志毅.男女性别分工与周礼父权宗法特质溯源[J].学习与探索,2005,27(5):25-31.
- [4] 赵东玉.周代“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的方方面面[J].孔子研究,2002,17(5):76-88,112.
- [5] 孔颖达.毛诗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6]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7]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8] 吴增祺.礼记菁华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9] 孙诒让.墨子间诂[C]//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 袁济喜,洪祖斌.诗经译注[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
- [11]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C]//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 公羊高.春秋公羊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3] 陈 澧.新刊四书五经·礼记集说[M].北京:中国书店,1994.
- [14] 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15] 郭 彧.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6] 高 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17] 刘 向.列女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8] 焦 循.孟子正义[C]//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 吕不韦.吕氏春秋[C]//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 [21] 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01,10(5):4-12.

